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

王邦佐 孙关宏

政治学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政治学。无产阶级的政治学形成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它的标志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发表。《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政治科学的纲领性文件。

当然,在《宣言》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象,对政治学说已经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从国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上分析政治问题,得出一系列正确的结论,《宣言》则对政治学说作了系统和完整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是政治学说史上的一场革命,开创了政治学发展的新阶段。

(一)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政治学说,从总体上看,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学说,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亚里士多德写了《政治学》,他把政治学和伦理学分开,是历史上第一个用剥削阶级观点创立政治学体系的人,但仍然有很浓的伦理学色彩。他用善、恶来衡量国家和政治,认为“中庸适度”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是最为理想的政治。

欧洲中世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本质上是由神学世界观支配的,教会信条成了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教会信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法庭中具有法律的效力,而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必须由教会来批准。

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是受典型的法学世界观支配的。法学世界观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义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在法学世界观看来,一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出来的。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自然法学派,如荷兰的格劳修斯、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德国的莱布尼茨等都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它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反映了人类的自然要求,是永恒不变的。在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美国1776年公布《独立宣言》,法国1789年发表《人权宣言》,提出“天赋人权”说。这虽然在历史上起过相当进步的作用,但它脱离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去孤立地谈人权,掩盖了人权的阶级实质。

即使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也摆脱不了唯心史观的束缚。他们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政治现象,认为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无从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灾难。但他们又完全抛开了法学政治领域,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主张用十足的劳动收入来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他们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找不到社会解放的出路。

同以上旧的政治学说不同,《宣言》用新的世界观来分析政治现象。列宁把这一新的

世界观概括为“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宣言》从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出发，在以下四个方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性和阶级性：

第一，它强调了生产方式对政治的制约性。一定的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社会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础。这是《宣言》的基本思想。《宣言》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指明了人们的一切政治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这就清除了过去关于政治的神秘色彩，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第二，它分析了政治现象的阶级性。《宣言》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分析政治现象，把阶级斗争作为一条基本线索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名言，指出了国家和政党的阶级性质，揭露了民族剥削的阶级根源。过去剥削阶级的政治学说掩盖政治现象的阶级性，目的是欺骗人民，而《宣言》则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第三，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性。《宣言》把政治学说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得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政治结论。但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靠别人恩赐的，而是依靠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斗争。这正是无产阶级所肩负的社会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宣言》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斗争的策略，既阐述了科学理论，又强调了革命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政治学说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四，它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战斗性。这不仅表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论述上，同时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敌视无产阶级理论的严肃批判上。它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并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才是自己战斗的胜利的旗帜。

（二）

从《宣言》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容及其所体现的方法论三方面看，它所阐述的许多重要原理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体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

第一，《宣言》阐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它明确指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宣言》叙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指明阶级斗争的结局，使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成为不可避免。《宣言》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斗争的过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等政治现象，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革命的改造，从而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

第二，《宣言》对国家这个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作了极为透彻的阐述，提出了新的科学结论。例如，《宣言》分析了国家尤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和它在历史上的暂时性，指出国家这个政治权力的共同特征是有组织的暴力统治，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当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消灭以后，当公共权力失去阶级性

以后，国家就消亡了。又如，《宣言》已接近于得出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列宁说：“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再如，《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主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虽然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但其基本思想在《宣言》中已相当明确了。《宣言》提出的“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取得政治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等等，实际上都谈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国体问题。

《宣言》还涉及到政体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然而，在《宣言》问世二年后，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批评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中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误认为是“社会共和国”时，实际上是把“社会共和国”视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人们只说无产阶级找到了巴黎公社的形式，找到了苏维埃的形式，找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而忽视了对共和制、尤其是社会主义共和政体的基本特征的研究。此外，《宣言》还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无产阶级争得民主，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就要运用国家政权一步一步地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把它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逐步剥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改造社会的具体措施，反映了无产阶级国家组织必须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现这十条措施，是为了向更远大的目标前进，即消灭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让公共权力失去阶级性，使国家消亡。当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完成后，代替它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联合体了。

第三，《宣言》阐述了革命的学说。它不是抽象地谈论革命，而是把革命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起来。《宣言》评价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指出它破坏了封建的、宗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便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严重地阻碍社会的进步，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消失了。《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暴力革命的思想同阶级斗争问题以及国家问题的理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宣言》还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德国当时的民主革命时，认为德国无产阶级要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地位，“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以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第四，《宣言》阐述了政党的学说。它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党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党的特点就是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具有彻底革命精神，在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因此，在实践中，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

方面,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目的,引导无产阶级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宣言》还阐明了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把无产阶级组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

第五,《宣言》阐述了民族问题。它把民族问题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指出民族剥削造成了民族间的压迫和隔阂,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民族剥削和压迫,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宣言》还强调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国际性,认为只有实现全世界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才能取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

第六,《宣言》论述了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斗争策略的基本原则:“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认为凡是反对现存旧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共产党人都应积极支持或直接参加进去,但同时一刻也不能忘记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而且对不同国家不同政治态度的反对党派,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国际上的正确策略是要促成各国民主党派之间互相支持和团结,从而壮大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以利于反对现存的旧的剥削制度。

《宣言》对上述政治学的各个重要领域颇为系统、完整的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体系。我们认为,如实地把《宣言》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大纲,对于了解政治学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宣言》的问世,在政治学理论上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传播和发展。

列宁结合俄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情况,对《宣言》中所阐述的政治科学的各个重要领域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例如,他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中阐明了政治斗争和党的学说;在《国家与革命》、《论国家》中论述了国家和革命的学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了革命的策略和策略;在《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阐述了民族问题的理论,等等。这是《宣言》发表半个多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俄国的新发展。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1920年《宣言》翻译出版,在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开始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政治学,如瞿秋白和张太雷在上海大学曾分别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政治学》,恽代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政治学概论》,并用此名出版了铅印的小册子,等等。到了三十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与研究政治学蔚然成风。邓初民在留学日本期间,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为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1930年他写了《政治科学大纲》,1939年又出版了《新政治学大纲》。这两本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述了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这些,实际上体现了《宣言》所形成的政治学的基本体系。

在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一直受到党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

义基础》等作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政治科学中诸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政权、革命、政党、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特别是革命的战略策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过深刻的论述和发挥。同时，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同志对党的建设问题也作过系统的、有独到见解的论述。这些具有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应在新的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受到苏联的影响以及随后的事态发展，不仅不承认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把它斥之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才发生根本了的变化。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正在迅速恢复和提高，政治学的重要性正在广泛地为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所认识。198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新起点。

从《宣言》发表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三十多个年头了，世界的面貌、中国的面貌尽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今天，学习和研究《宣言》，仍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第一，从指导思想来看，中国的政治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曾经有过一种看法，似乎因为要重视研究政治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可以少学甚至不学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宣言》作为每个普通工人必读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恐怕是任何一本别的书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每次重新学习它，总会有新的收获，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它，也是如此。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定要向前发展，但是，《宣言》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事实上，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地解决新问题，可是他们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发展了这些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许多原理散见于革命导师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在建设中国政治科学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加以发掘，系统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其理论体系，以作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思想武器。

第二，从内容上看，《宣言》对当时条件下的阶级、国家、革命、政党、民族、战略策略等政治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比如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分析无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产者生产和增殖资本这一本质特征时，很自然地是联系他们那个时代无产阶级的重体力劳动和物质上的贫困化来加以说明的。如今，西方某些国家相当多的工人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些人有了汽车、电冰箱、甚至私人住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当然不能再去简单重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工人状况的具体描绘，而必须运用基本原理对新出现的现象予以科学的解释。试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来说，就应该以新的材料来论证现代化大生产由于要求劳动力具有更高的技能和更专门的知识，因而劳动力的价值提高了。当今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实际上是资本家在新条件下剥削工人的需要。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就要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问题，诸如社会主义社会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政体、干部制度等等。因此，现在和将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下转第74页）

独具的，甚至成年人的活动也并非在一切场合下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比如，某些成年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或沉思的时候，常常会进行一系列潜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尽管在人类的整个实践活动中占着很小的比例，但它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特别在人类刚起源的时候，它作用又如何，都是值得深入地加以探讨的。另外，皮亚杰关于活动图式在儿童智力的发展中逐步内化为逻辑数理结构和概念的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实际上进一步证实并丰富了列宁关于逻辑范畴和人的实践活动关系的论述。列宁这样写道：“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哲学笔记》第203页）对此，以往我们往往理解为：逻辑范畴的内容来源于实践活动的内容。其实，列宁的这段论述不仅包含着这层意思，还更多地包含着逻辑范畴的格即结构来源于实践活动的结构（亦即皮亚杰说的动作图式）的意思。重视列宁和皮亚杰这方面的思想，不仅应从内容上来研究逻辑概念的起源，同时也应从结构上即从动作图式内化的角度上来研究概念的起源，从而全面地说明实践活动在人类整个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生认识论对各种具体的科学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美国心理学学会甚至认为，皮亚杰“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第17页）。皮亚杰之所以能在认识论上作出重大的创新，这和他所生活的整个时期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发生认识论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发生认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皮亚杰对认识主体的社会属性的分析不够。尽管在1967年出版的《儿童心理学》一书中，他对主体的社会性作了较多的论述，并强调指出：“‘社会性’这一名词切不可仅从狭义的教育、文化或道德的交往来理解，而应同时包括认知、情感和道德各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化过程。”

（《儿童心理学》第72页）但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他几乎完全略去了这方面的论述，而单纯从心理上、生理上来考察个体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诚然，儿童的社会联系没有成人那么丰富，但忽略了个体的社会属性，是不可能对认识论问题作出彻底的解决的。另一方面，皮亚杰虽然看到了活动在主体认识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他说的活动本身毕竟只是个体的动作和行为，至于它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关系如何，他并没有加以深究。这样，正如李泽厚同志批评的，皮亚杰必然最终地把活动生物化，归结为单纯的生物机制，从而走向迷途（《批判哲学的批判》第81页）。这些不足之处，也是我们在分析、借鉴发生认识论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上接第21页）

内容势必会不断地得到更新；而只有发展更新，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

第三、从方法上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仍然应该坚持。具体地说，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抛弃的，对比研究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也是用之有效的。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日本等国政治学者所运用的某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统计技术等，有的也可以借鉴，从中吸取合理有用的东西。总之，要充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以便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